



双洲记

Shuang Zhou Ji

——政党国际交往亲历

艾平◎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双洲记

Shuang Zhou Ji

——政党国际交往亲历

艾平◎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 / 艾平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8

ISBN 978 - 7 - 5090 - 1419 - 6

I. ①双… II. ①艾…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8508 号

书 名：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010) 83908455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7.5

字 数：205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090 - 1419 - 6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艾平，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1969年1月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3年9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77年10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非洲局局长、一局局长。1979年9月至1981年6月赴加拿大留学，1995年2月至1996年2月在山东省桓台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

内 容 简 介

一生献身国际交往，几十年故事汇集。本书通过作者参与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和亚洲国家政党交往的亲身经历，展现国外政党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通过一系列生动事例，彰显中国共产党引领拓展新型政党关系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李丽丽



自序

本书《双洲记》是我对亲身经历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的回忆。我自1977年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至今已逾40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努力同步。其间主要负责同非洲和亚洲两大洲数十个国家的交往，这部分工作较少为人所知却并非不重要，记述下来奉献给读者。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曾引用过英国作家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书中的话。狄更斯以伦敦、巴黎两座城市为背景写出不朽名著。本书受其启发，故名《双洲记》。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1966年，在原本应该上学读书的年龄，我们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有了“老三届”这样一个称呼。1969年1月，我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一千三百多名“北京知青”一道，前往陕西延川插队落户，通过艰难的生活而非读书理解国情。1973年，我作为这代人中的幸运儿，被推荐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国门洞开的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前掌握了英语这一国际交往的得力工具。1977年，我被分配到中联部非洲局，自此一直从事党的外事工作。

我在中联部的职业生涯，可谓善始善终。1977年底，在我入部仅两个多月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那年12月20日，中央批复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同意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国家执政党建立关系，突破了只同马列主义政党交往的传统作法。当年，中联部时任非洲局长吴学谦向我们传达中央这一决定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吴学谦告诉我们，我们党曾长期坚持只同共产党来往。中苏论战开始之后，又将许多跟着苏共走的外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党，中断了同它们的来往。非洲大陆相对落后，本来共产党就很少，而同我交往较多的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也中止了同我党的交往。同时，一些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就得到我们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执政后仍然希望继续以党的名义同我交往，我方却往往以对方不是共产党或者马列主义政党为由，拒绝与之交往。最近，莫桑比克党政第二把手、议长多斯桑托斯希望率党政代表团来访，我方不同意，坚持要对方去掉那个“党”字，仅作为政府代表团来访。访问期间，中方给对方安排了很高的礼遇，请华国锋主席会见。即使如此，对方仍耿耿于怀，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将陪同会见的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同志留下来，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总称我“同志”，我未搭腔，他肯定有感觉。你们外交部、中联部认真研究一下，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否有利。对于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两部认真研究后起草了请示上呈中央。结果，不仅是对非洲的政党工作实现突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整个对外交往都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13年12月16日，在我即将离开中联部领导岗位之前，王家瑞部长带领部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十八大以来的工作。作为总书记听取中联部工作汇报，在历史上恐怕也为数不多。

在这“始终”之间，就是我的职业生涯。在中联部期间，我先是从事对非洲的工作。从新入部的大学生开始，逐渐成为一名称职的口语翻译，具备了“国际舞台上群众演员”的资格。随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积累关于非洲的知识，努力成为这条战线上的哨兵和参谋。其间除了两年留学、两年到中央党校接受培

训、一年到基层挂职，一直没有离开非洲局。直到2000年，通过公开选拔，我成为驻外使节后备人选。次年，受命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在这个代表国家的岗位上干了三年五个月，2004年结束任期返回中联部。从2005年起，我先是在一局主持工作，后来担任局长，一共五年时间。当时中联部一局承担着与南亚、东南亚15个国家的政党联络工作，同时还负责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有关的多边交往。2010年，我受命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分管本部调研工作以及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总的来看，我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的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通过参与对外交往的实践，我有机会亲身体察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演进。首先是将党际交往扩大到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政党以外，不断拓展联系世界各国决策集团以及整个世界主流社会的新的渠道。其次是进一步丰富新形势下党际交往的原则、形式、内容和特色，使之符合各方的实际需要从而具有可持续性。再次是在形成党际交往特殊渠道和交往内容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国家的总体外交，特别是配合首脑和政府外交的需要。

实际上，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对外交往实践，不断深化对当今世情的认识，逐渐走向世界政党舞台中心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性丝毫没有下降，反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诚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跨国公司。然而首脑峰会和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协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乃是最大的政治，理应成为执政党的首要关切。而对外关系往往成为后发国家能否实现赶超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政治家们通过政党等渠道的交往，

可以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更少拘束的交流。显而易见，包括政党交往在内的总体外交是中国外交的特色与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总体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鉴古论今，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盖棺论定显然太早，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从参与者个人的角度讲些故事，这也是“记”的本意。

这本书，首先是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人写的。对老领导，是汇报；对多年的同事，是分享；对后来者，是期待。这40年，党的对外交往对象不断扩展，工作成效日益显现，对国家总体外交和党自身建设的贡献越来越大，经验教训值得梳理，我在其中的甜酸苦辣应能对后人有所启迪。

当然，这本书更是为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乃至整个中国外交的广大读者写的。这40年，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应该说开放同改革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密切相关，而中华民族先锋队国际交往日益丰富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尽管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总体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具体情况却往往并不为人所熟知。党的对外工作要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支持，也需要更广泛地为人所知晓和理解。

我在这里除了尽可能掀开神秘面纱讲些故事，也希望初步梳理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走出相对封闭的状态，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尽管我本人从事的主要是同友好国家的交往，其中也还是需要克服困难，开拓创新。要积累知识，开阔眼界，知行合一，找到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和实现方式。当前，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走向国门，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不断加深对世情的认识将会像改革开

放初期深刻认识国情那样重要。希望我的经验教训能够发挥些许积极作用。

全书分为三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上路”，主要讲述为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做的准备，包括从童年到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一章：“起点”，内容包括清华园里的童年、“文革”风起、知青岁月、参加工作。说明以插队落户形式获得的对国情的初步认识，成为毕生同外国人打交道、研究外国问题的基础。第二章：“入行”，讲述作为“工农兵学员”学习英语的曲折经历和进入中联部后在老同志指导下提高翻译水平的经过。第三章：“留学”，叙述加拿大留学经历。我很同意有些人把留学称为“洋插队”的说法，它使我的眼界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第二部分“非洲篇”，介绍参与中国共产党对非交往与合作的全过程。第四章：“群众演员”，描述作为口语翻译等初、中级官员直接参与中非政党交往的所见所闻。第五章：“知与行”，介绍通过调查研究、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特别是实地考察和直接交往等各种渠道、方式逐渐深化对非洲认识的过程。第六章：“代表国家”，讲述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参与对非交往的探索和成效。第七章：“重返非洲”，主要讲述多年后以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再访非洲，享受丰收的喜悦，梳理经验教训。第三部分“近邻篇”，记述从事对南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工作中的故事。第八章：“迷人的印度”，介绍同这个与中国有同样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面临相似艰巨、历史性的现代化课题国家的各类政党交往的经历。第九章：“中巴情深”，讲述在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的复杂条件下，努力使党的交往同中巴传统友谊相适应的艰辛过程。第十章：佛国新缘，描述与尼泊尔这个刚刚经历了武装斗争、正在废除王室、走向共和进程中的国家不同政党交往的故事。第十一章：多边渠道，叙述中

国共产党参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这一多边组织活动的具体内容。第十二章：“下南洋”，讲述同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情况。最后是结束语与致谢。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党的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给我带来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我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也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党的对外工作中。

下面，就让我来讲述其中的故事。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部分 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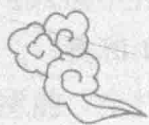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起点	2
第二章 人行	16
第三章 留学	29

第二部分 非洲篇

第四章 群众演员	48
第五章 知与行	73
第六章 代表国家	104
第七章 重返非洲	133

第三部分 交友周边

第八章 迷人的印度	153
第九章 中巴情深	174
第十章 佛国新缘	197
第十一章 多边渠道	217
第十二章 下南洋	235
结束语	261
致谢	267



第一部分 上路



相对本书的主体，这一部分只是引子，简述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出象牙塔，走入社会。在一个农业人口占 80% 的国家，还要走向农村。失去正规教育的机会，更加渴望获得知识。认识社会，不仅通过书本，更要通过生活、劳作与谋生。

走向世界，还要有适当的准备。在国门即将洞开的时刻，最好的准备莫过于掌握国际通行的英语。其次，是获得参与外事工作的身份。

这些都不是可以计日程功的，还要负笈海外。北美成为我第一个涉足的海外大陆。不仅提高英语，而且有一段“洋插队”的经历，最后隐约约明白了我的毕生事业是国际交流与理解。



第一章 起点

清华园里的童年

1953年8月4日，我出生在北京清华园。到1969年1月13日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出发去陕北插队落户，我在那里度过了15年时光。

国人几乎都知道，清华园是清华大学的校园。清华园原本是皇家园林。20世纪初，在中国外交官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打算退回超出美方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发展赴美留学等教育、文化事业。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拟建“游美肄业馆”，请求“恩赏”清华园，得到清廷批准。1911年4月9日，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1922年正式设立“国立清华大学”。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的首要途径是新式人才的培养，而新式教育机构的设立、发展、演变反映出沧海桑田的曲折进程。清华没有直接“太学”的嫡传血统，却有外来的经费保障，课程也更同美式教育“接轨”，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建设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更为直接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其别称也从“中国的麻省理工”变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出生在这里，应该说是极大的幸运。

我的父亲艾知生，原籍湖北省汉阳县，1928年出生，1946年考入清华。后投身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1950年毕业后留校。1951—1966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是“文革”前全国最年轻的校级领导之一。我的母亲齐卉荃，

1930年出生，原籍河北省蠡县，1949年在北京女一中入党，后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我和1955年出生的弟弟艾民都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进托儿所的“全托班”。那时，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似乎非常明确，用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话说就是“一条龙”：从清华幼儿园到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长大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孩提时代，父母的工作都极繁忙。上小学后，我就成了第一代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到食堂打饭吃的孩子。功课自然全靠自己，父母的关心更多地体现在为我们购置的《十万个为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课外书上。有时，我也会翻看父亲的“内部读物”，如《中央情报局内幕故事》。

当时，清华大学领导不仅迫切希望尽快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工程师，而且关注如何使附属中学和小学的教育与之相适应。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有过将中小学教育改成“九年一贯制”的设想；后来虽然摆脱了最初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在小学上了五年制实验班，比同龄人早一年升入中学。

然而，我们进入清华附中不到一年，“一条龙”就戛然终止了。“文革”风骤起，席卷清华、北大。当时的时髦说法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清华附中成了第一支“红卫兵”诞生的地方，而我，却因为爸爸是“黑帮分子”（后来改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其量也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当时还未满13岁，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惊得目瞪口呆。然而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班上一个与我同岁的同学竟然少年老成地劝我不必过虑，等到运动“后期”会有机会“平反”。我希望他的话能够变成现实，然而当时并无迹象证明他的早熟：我们被赶出

原来的住所，挤在工棚改建的平房中栖身。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文革”运动都很快失去控制。没过多久，清华爆发了“百日武斗”，爸爸被关进科学馆的地下室里，只能由我和弟弟轮流去送饭。我们家的南北两侧，分属武斗双方的制高点，房顶常有冷弹飞过。

运动发展到后来，显然高层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局面必须尽早改变。于是，由解放军和首都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园，制止了武斗。可下一步怎么办？据说领导层认为我们已经在“文革”中得到洗礼锻炼，是该毕业的时候了。然而当时既没有高一级学校招生，城市里也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插队落户。1969年1月，一队大轿车拉着我们从学校驶向北京火车站，启程赴陕北插队。当车过清华西校门外，我望着远处曾住过的16公寓，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刚过15岁，前路茫然，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此生此世能否再回到熟悉的清华园？面对时代的洪流，我实在没有把握。

插队落户

1969年1月17日，我来到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八甲村插队落户；两年零两个月后，我被县副食品公司招募为合同工；又过了差不多两年半时间，我被推荐并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为英语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其间，我在陕北生活了近五年时间，应该说，延川是我的人生启蒙之地。

从清华园到八甲村，路上走了五天。当时火车速度很慢，经过一天多时间才到达终点站铜川，我们在铜川又住了一夜，这样两天时间就过去了。第三天，我们又坐上军用卡车，从铜

川奔赴延安。当时这段路全都是沙石路，240 公里左右卡车差不多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到延安已经是晚上，只能住下来。第四天一早继续坐卡车上路，先到了延川县的冯家坪公社，吃了午饭后，再步行翻过一座山，到达关庄公社又住一晚。次日，也就是离开北京的第五天，我终于到了插队落户的八甲村。

从北京到陕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关庄之前徒步翻过的那座山。当时我只有 15 岁，身高还不到一米六，见到那座山，觉得高的耸入云霄。等爬到山顶一看，目力所及都是那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被沟壑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塬峁岭沟，一直绵延到天边。当时，回想起几天来一路奔波，感觉已经离北京非常遥远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心里真是百味杂陈。

我插队的关庄公社后来出过一个很有名气的知青作家，也来自清华附中的史铁生。关庄公社所在的那条川叫青平川，他插队的那个村叫关家庄。他在那篇著名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小说里，把村的名字改成清平湾，作为背景描述了在村里的生活。

我插队的八甲村，原来有大约三十多户、一百余口人。八甲当时算是一个生产队，同邻村二甲一道组成二八甲大队，再往上则是关庄公社。关庄一共来了三百多名北京知青，二八甲大队一共二十名，两个村各十名。

我们村的十名知青六男、四女。六名男生都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其中五名来自清华附中，另外一名是外校同朋友一起来的。四名女生当中，两名是六八届的高中生、两名是初中生。

两年多的插队生活给我留下了四点印象。